

中國古代三百六十行

ZHONGGUOGUDAI
SANBAILIUSHIHANG

王水福 主編

方健 湯敏 編著



王水福

主编

方健

汤敏

编著

中國古代三百年行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古代三百六十行 / 王水福主编. — 杭州: 杭州出版社, 2008.1

ISBN 978-7-80758-051-5

I. 中… II. 王… III. 职业—史料—中国—古代 IV. D693.9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95836 号

中国古代三百六十行

王水福 主编

责任编辑 汤 敏

美术编辑 张 磊 祁睿一

出版发行 杭州出版社

(杭州市曙光路 133 号 310007 0571-87997719)

印 刷 杭州星晨印务有限公司

制 版 杭州美虹电脑设计有限公司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开 本 889 × 1194 1/16

字 数 500 千

印 张 20.75

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80758-051-5

定 价 180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(如有印装错误,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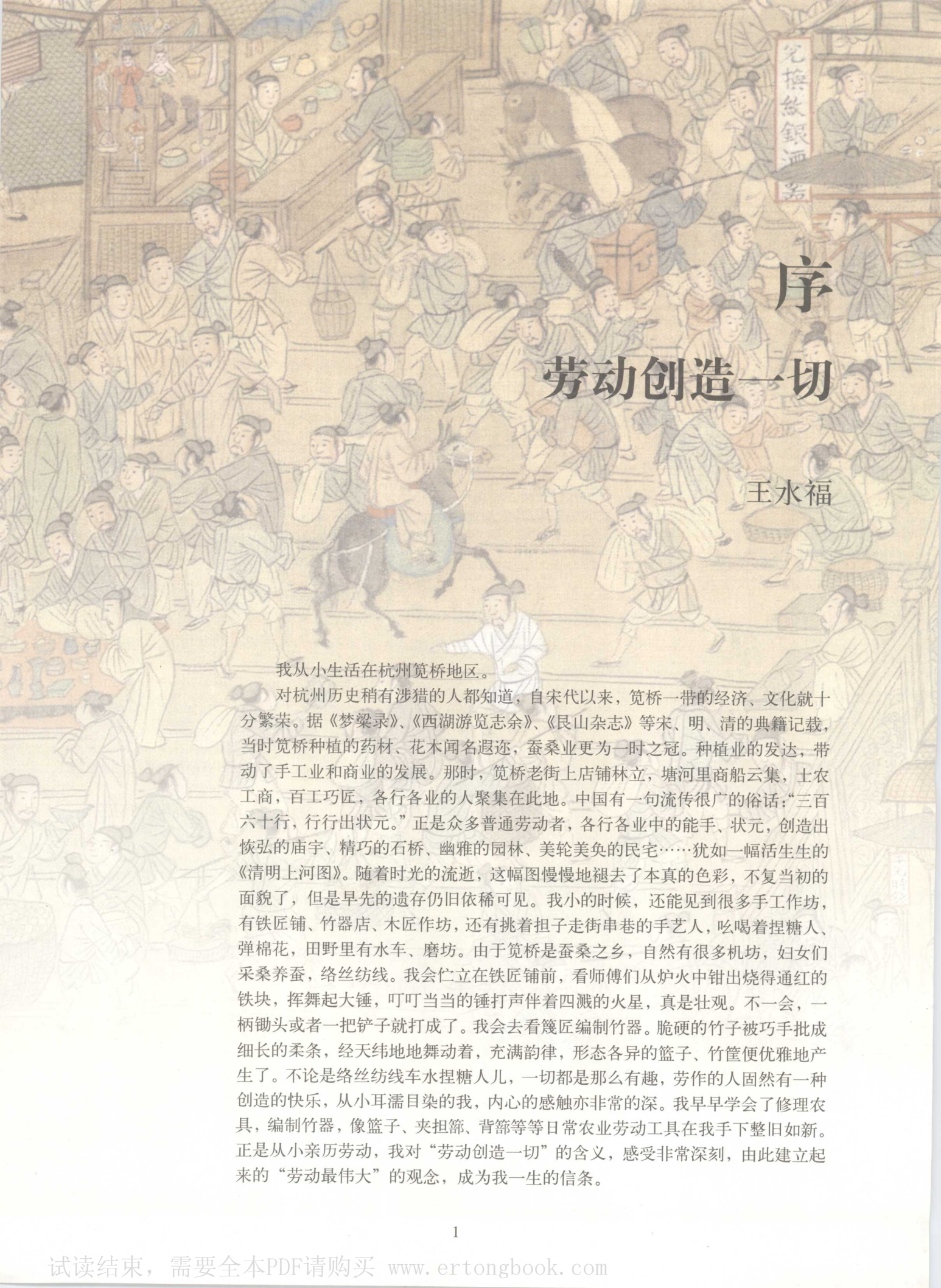
三 百 六 十 年



主编简介

王水福先生，一九五
五年一月出生。

现任西子联合控股有
限公司董事长。浙江省第
九、十、十一届人大代表。
全国劳动模范。



序 劳动创造一切

王水福

我从小生活在杭州笕桥地区。

对杭州历史稍有涉猎的人都知道，自宋代以来，笕桥一带的经济、文化就十分繁荣。据《梦粱录》、《西湖游览志余》、《民山杂志》等宋、明、清的典籍记载，当时笕桥种植的药材、花木闻名遐迩，蚕桑业更为一时之冠。种植业的发达，带动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。那时，笕桥老街上店铺林立，塘河里商船云集，士农工商，百工巧匠，各行各业的人聚集在此地。中国有一句流传很广的俗语：“三百六十行，行行出状元。”正是众多普通劳动者，各行各业中的能手、状元，创造出恢弘的庙宇、精巧的石桥、幽雅的园林、美轮美奂的民宅……犹如一幅活生生的《清明上河图》。随着时光的流逝，这幅图慢慢地褪去了本真的色彩，不复当初的面貌了，但是早先的遗存仍旧依稀可见。我小的时候，还能见到很多手工作坊，有铁匠铺、竹器店、木匠作坊，还有挑着担子走街串巷的手艺人，吆喝着捏糖人、弹棉花，田野里有水车、磨坊。由于笕桥是蚕桑之乡，自然有很多机坊，妇女们采桑养蚕，络丝纺线。我会伫立在铁匠铺前，看师傅们从炉火中钳出烧得通红的铁块，挥舞起大锤，叮叮当当的锤打声伴着四溅的火星，真是壮观。不一会，一柄锄头或者一把铲子就打成了。我会去看篾匠编制竹器。脆硬的竹子被巧手批成细长的柔条，经天纬地地舞动着，充满韵律，形态各异的篮子、竹筐便优雅地产生了。不论是络丝纺线车水捏糖人儿，一切都是那么有趣，劳作的人固然有一种创造的快乐，从小耳濡目染的我，内心的感触亦非常的深。我早早学会了修理农具，编制竹器，像篮子、夹担筛、背筛等等日常农业劳动工具在我手下整旧如新。正是从小亲历劳动，我对“劳动创造一切”的含义，感受非常深刻，由此建立起来的“劳动最伟大”的观念，成为我一生的信条。

上述劳动场面现在已经很难见到了，对此我有几分惋惜，几分遗憾。虽然我明白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，旧的生产方式必然消亡这个道理，但是内心总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结。这些旧的业态，不仅形象、直观地揭示了劳动的真谛，而且反映了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特定阶段的社会生活，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最好说明。我想永久地保留这一份社会文明记录，于是主持编纂了这部《中国古代三百六十行》。这部书以经济高度发展的宋代江南地区为主，记录了古代中国社会各行各业的实况，并配以精美的图片，生动形象地展示了当时的社会生活，既有史料性，又有观赏性。这部书的出版，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我的缺憾，也给不谙史事的青少年提供了一个历史读本。历史经验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，而作为历史经验载体的历史信息，更需要长期认真、细致地收集整理。我在西子联合的内部管理中，经常强调要重视此项工作。西子创业伊始，也只是一个敲敲打打的作坊而已，是一种初始的手工状态。西子联合发展至今，单就技术进步而论，和当年已经不可同日而语，但是，现在的技术进步正是在当年的基础上逐步演进、继承、发展而来。

古老的三百六十行，涵养了劳动精神和创造意识，并且孕育出新技术、新工艺。重温历史信息，回顾先人的生产生活状况，使我们对劳动创造世界、社会发展的观念有更深切的认识，从而进一步激发我们的劳动热情，进一步激发我们的创造性。

2007年6月于杭州



绪 论

关于三百六十行的历史考察： 从先秦到明清

“三百六十行，行行出状元”，这在我国是家喻户晓、妇孺皆知的熟语。但究其来历，尤其是这三百六十行包含哪些内容，其历史沿革又如何？这却是困扰学界的一大难题。探究行之起源，似应先从市说起。《太平御览》卷一九一引《说文》关于市有一简明扼要且很确切的说明：“市，买卖之所也”，即指可供商品交易、买卖的场所。

（一）

古文献中关于市的最早记载当首推《易·系辞下》：“包牺氏没，神农氏作。斫木为耜，揉木为耒。耒耨之利，以教天下，盖取诸《益》。日中为市，致天下之民，聚天下之货，交易而退，各得其所，盖取诸《噬嗑》。”据朱熹的诠释，乃“借噬为市，嗑为合也”。即“日中为市”，符合《噬嗑》合市之义。神农为上古神话传说中无所不能的人物，事之有无，无足征信。但据考古发掘，在大汶口文化中期，距今5500余年前，轮制陶器技术已开始使用，标志着手工业从农业中逐步分离而开始形成独立的经济部门；同时玉器、象牙器、陶器也大量出土，说明剩余产品增多，经济有了发展，出现商品交换就是历史的必然。文献中关于市的记载也渐渐增多。如《淮南子·览冥训》有关于黄帝时代“道不拾遗，市不豫贾”的记载；《世本》则载有颛顼时代“祝融作市”（《太平御览》卷一九一引），似可与神农时代“日中为市”相发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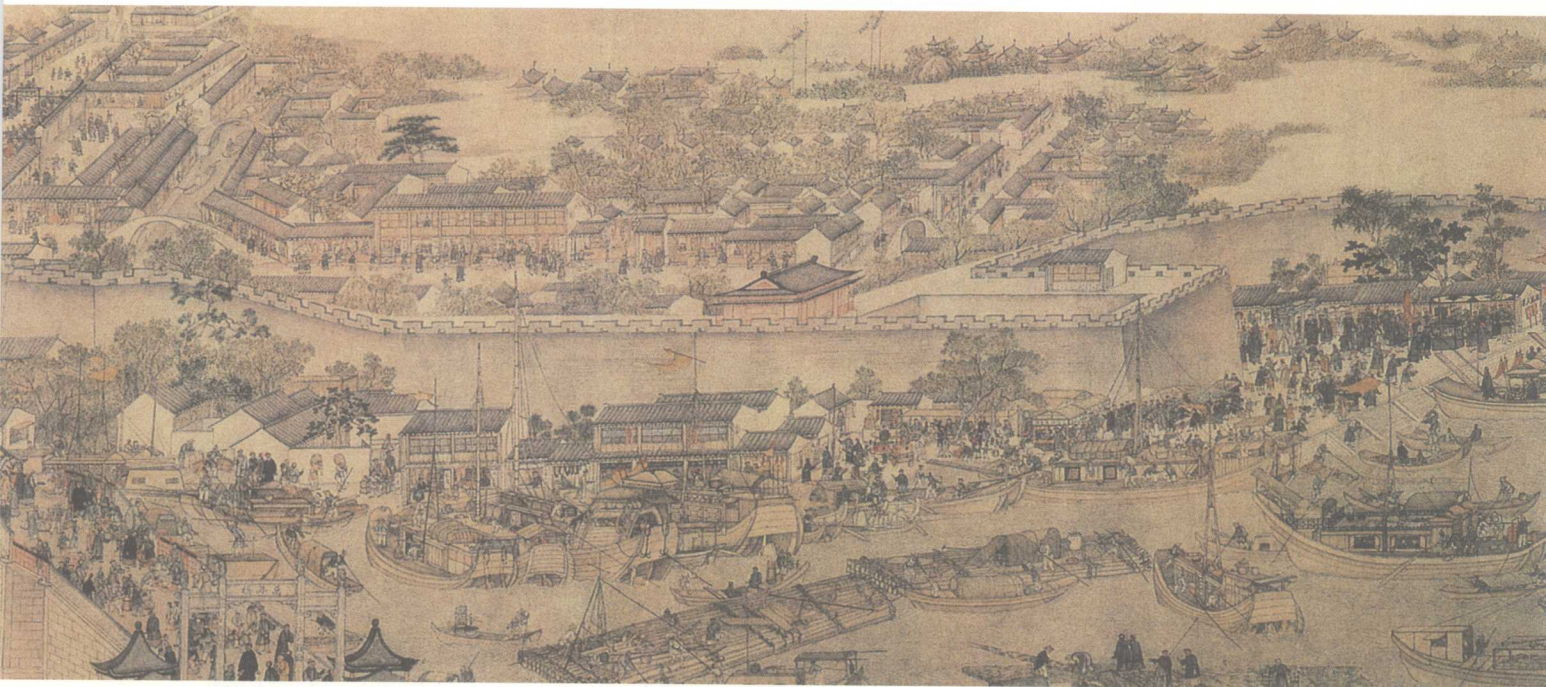
《管子》称：“桀放虎于市，以观其惊”；《六韬》曰：武王伐纣时，殷商宫室“大者百里，中有九市”（《太平御览》卷八二七引）。可证夏、商时期市之发育程度已渐高。市井成为热闹之处，而“百里九市”则可证市之密集程度。尽管这种旋聚旋散的市集也许只是“各以其所有易所无，抱布贸丝而已”，即仅为物物交换

的互市性质的集市；而且农忙之时便“道路罕行，市朝生草”（《盐铁论·错币》、《力耕》）。这或许是夏商时期市集的概况，但市场的形成已是不争的史实。在商都朝歌已有规模不小的市肆，如太公望乃商末名人，《尉繚子·武议》说他在致仕之岁还“屠牛朝歌，卖食孟津”。此说得到《楚辞·天问》等一些先秦文献的证实，似非空穴来风。朝歌市肆应有这样一位操刀屠牛卖肉的老者，故《战国策·秦策五》也称之为“朝歌之废屠”。

至迟在西周，已有了比较规范意义上的市。《周礼·地官·司市》有云：“大市，日昃而市，百族为主；朝市，朝时而市，商贾为主；夕市，夕时而市，贩夫贩妇为主。”一日三市，乃西周镐京市场功能各异的三种市集。大市保持了三代以前“日中为市”的传统，四方辐辏，凡在半日行程商圈范围内的买卖双方群集于市，是最热闹交易也最兴旺的集市。朝市，或为批发商之间的集市，互通有无后，再赴大市或附近集市交易。夕市的贸易对象主要是小本经营的贩夫贩妇，将“桑弧箕服”之类的商品或大市剩余的物品交易后以备运往郊野或外地集市贩卖。值得注意的是：不仅有了行商、坐贾、批发商、零售商的分工，而且有了以固定交易对象为主的专业市场的分工和商圈的辐射范畴。更值得重视的是：西周已有了管理市集的市官，其长称司市，别称市师。据孙诒让《周礼正义》：“司市者以下至泉府十官并掌国市政令、刑禁、货贿之事”；当时规定不能以贾人充市官，见《荀子·解蔽》：“贾精于市而不可以为贾师”，似乎为了防微杜渐，商贾精于市道而易舞弊贪贿。西周之市设市官10员，可见已具相当规模；至唐代，“中县户满三千以上”，始“置市令一人，史二人”；而三千户以下县市，则不得置市官（《唐会要》卷八六）。

春秋战国时期，商业比较发达，市遍及各地。如春秋吴越争霸时期，著名的吴市在今苏州市中心一带。伍子胥逃亡来吴，鼓腹吹箫乞食于吴市，被善相术的吴市吏推荐给吴王僚而获大用。事见《史记·范蔡列传》，又见《吴越春秋》卷三。相传汉梅福曾弃官隐于吴市为市西门卒，以避王莽之乱。可见吴市一直延续至两汉之际，“大隐隐于市”，也说明吴市是人烟辐辏的热闹之地。当时楚都郢市是另一个享有盛名的大市，《左传·宣公十四年》记载：“楚子伐宋……车及于蒲胥之市”；《说苑·贵德》也称“孔子之楚”，时渔者献鱼说：“天暑远市，卖之不售”，“不如献之君子”。古代文献中不乏关于郢市的其他记载，除贩茅者之类的小商贩外，还有各种行业的坐贾店铺，如刀俎之肆、屠羊之肆、枯鱼之肆，并设有“市令”、“市长”之类的官吏管理。这些专业的市肆，应是行最早的雏形。所以贾公彦《周礼注疏》卷一五说周之“肆长”即唐之“行首”。东汉桓谭《新论》就有关于郢都“市路相排突”的记载。楚国在我国历史上最早使用固定形式的金币，称楚郢、郢爰或爰金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屡有出土，以1982年在江苏盱眙发现的重610克、含金量高达99%的郢爰为最大。同时出土的兽形金壶，已是国宝级文物，今藏南京博物院。此外，楚制金币还有陈爰、卢金等。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，楚国还铸有银币流行于市。金银币最早出现在郢市，说明该市商业经济的繁荣兴旺。

据考古发掘，秦都雍城内战国时期市的遗址，规模相当大，南北长160米，东西长180米，面积近3万平方米。四面围墙的中部各有“市门”一座，门上似有四坡式大屋顶建筑，围墙内为封闭式露天市场。出土有秦半两钱及“咸阳□里”字样印文的陶器底部残片，应是当年市场交易的遗存物。秦孝公十三年（前349），定都咸阳后，秦国县以下地方基层行政单位为乡、里。此外，各地还设置了许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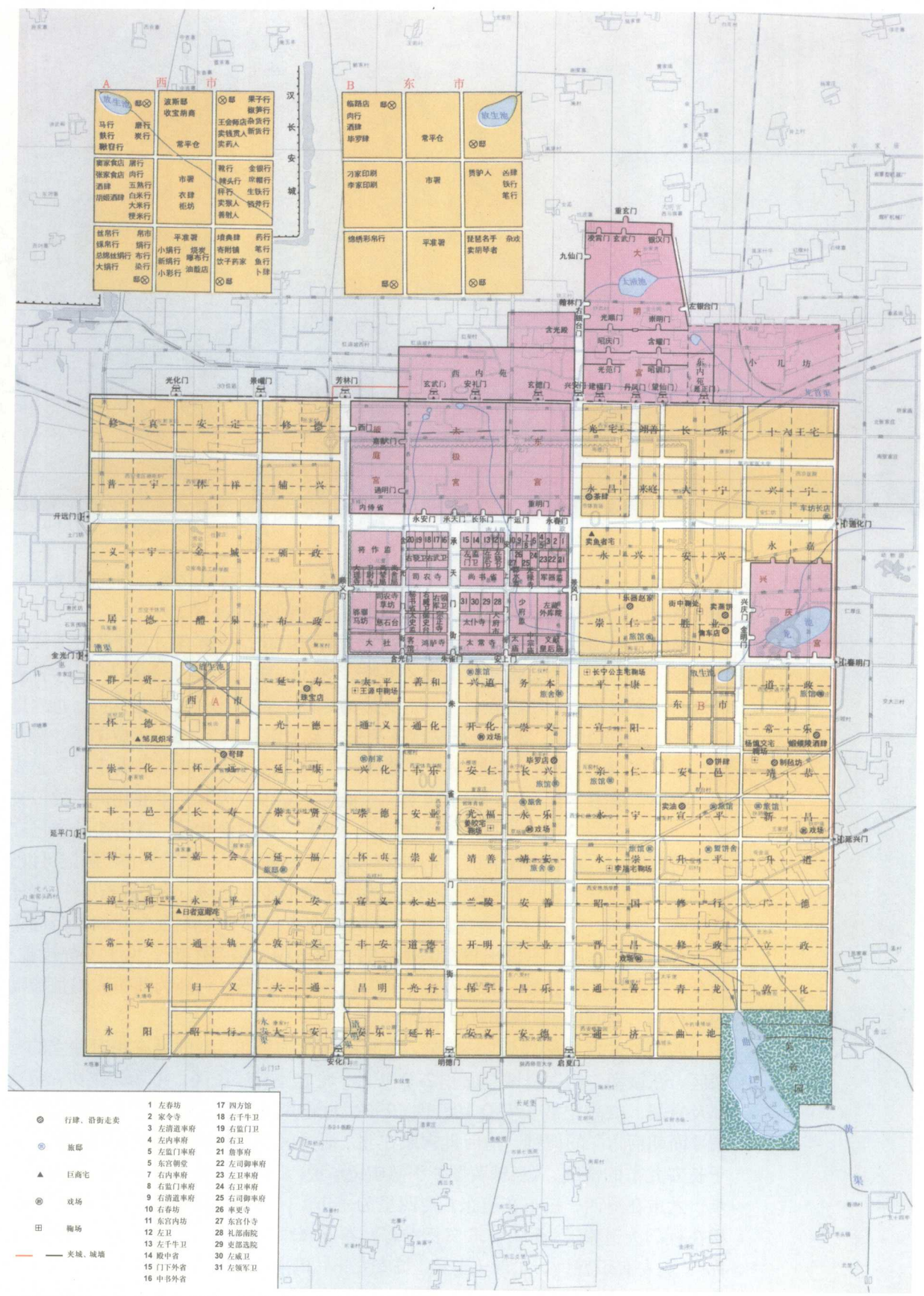


清·徐扬·姑苏繁华图（局部）

亭，其中之一即为市亭，如咸亭、杜亭、芷亭、焦亭、丽亭之类，即为管理手工业和商业的，但亭无行政职能。此外，还设有掌邮驿的亭等。

秦统一中国后，秦都设有咸阳市，位于渭河以北，其市有门，是秦帝国最大的商业市场。吕不韦曾将其主编的《吕览》“布咸阳市门，悬千金其上”，称有能增损一字者赏千金。暴虐的秦二世定此最为热闹的市集为杀人行刑之处。据《史记·李斯列传》记载，秦二世及赵高杀戮公子及大臣蒙毅等12人于咸阳市；秦二世二年（前208）七月，李斯父子又被腰斩于咸阳市。从此开“刑人于市”之先河。此外，咸阳还有直市，位于城南，先秦时已立市，因其“平准物价，故曰直市”。据《长安志》载，直市“在渭桥北”，因西汉后渭水北侵，直市遗址或已在今渭河河床中。咸阳还有平市，今咸阳秦家沟秦墓陶罐上印有“平市”戳记可证。此或即直市的异名。此外，咸阳还设有买卖奴婢的专业市场，称“奴市”；一直延续到两汉之际，《汉书·王莽传》载：“置奴婢之市，与牛马同栏。”此奴市当与牛马市合而为一。咸阳另设出售军需用品的专业市场，称“军市”，见于《商君书·垦令》的记载。规定女子不得入市，商人自备铠甲兵器，可能为随军人出征流动的“行市”，也是战国晚期就有的市。

西汉长安城实测周长25700米，总面积36平方公里。城内设有相对独立的宫殿区，在城南，约占全城总面积2/3以上。城北还有居民区、市场、作坊、蛮夷邸及官署。文献记载长安有108里、9市，城市规划体现了《周礼·考工记》所谓“面朝后市”的原则。与后世宫城在北、居民区在南的城市布局明显不同。关于长安九市的情况，《三辅黄图》引《庙记》说：“长安市有九，各方二百六十六步。六市在道西，三市在道东。凡四里为一市。……市楼皆重屋。”又曰：“旗亭楼在杜门大道南。”而宋敏求《长安志》卷五《八街九陌·前街》引《汉书》却称：“长安有炽盛街，九市（注云：长安九市，内六市在道东，三市在道西）。”据史念海先生主编的《西安历史地图集·长安城图》，长安东、西市处于南北向的华阳街和东西向的夕阳街交叉路口，东市由六市组成，西市由三市组成。显然，宋



唐长安城商业及娱乐场所图 (载史念海主编《西安历史地图集》页 95)

敏求的说法比较正确，而《三辅黄图》也许正好把方向搞反了。但令人费解的是，《太平御览》卷一九一引《宫阙记》和《西都赋》“九市开场”下李善注引《汉宫阙疏》也说：“其六市在道西，三市在道东。”也许与《庙记》出于同一史源，而汉代文献与宋人所标地图方位正相反之故。参见程大昌《雍录》卷二《汉长安城图》及“横门”条。长安九市凡占36里，占宫城以外长安城160里的22.5%，占全城36平方公里的7.5%。市区面积之大，堪称空前绝后。

张衡《西京赋》曰：“尔乃廓开九市，通阓带闾，旗亭五重，俯察百隧；周制大胥，今也惟尉。”是说长安九市占地广阔，围墙相连，墙有市门。市署所在地称旗亭，有五层楼，足以俯看市区大小道路。“百隧”形容其多，带有文学夸张色彩。最后两句，是说周制市官称市师或司市，归地官管辖，故称“大胥”；汉制，市署令由三辅都尉掌之，此即张衡赋中“惟尉”的含义。无独有偶，班固《西都赋》也云：“内则街衢洞达，闾阎且千；九市开场，货别隧分。人不得顾，车不得旋，阊城溢郭，旁流百廛，红尘四合，烟云相连。”汉代长安不仅市有门，居民区的“里”也有墙和门，“闾”指里门，“阎”指里中之门，此指里门之多，里分布之广（据《文选》李善注）。九市开市时，经销同类商品的店铺组成“列肆”，即按货类组成的同业商街，店面也为同规格的沿街敞开的廊房，“列肆”即商店间及每排商店街之间的通道称“隧”。班固《西都赋》中所谓的“货别隧分”，就是最早的“行”。只不过当时没有记载行的数量而已。但可以确定的是肆设肆门，置肆长负责管理同行的商业活动。班固赋中最后几句，充分反映了长安九市商肆密集，车水马龙，人们熙来攘往，商业经济繁荣的景象。汉代市的布局构成图，在今四川成都市郊外出土的东汉画像砖有逼真的反映（《四川汉代画像砖》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，1987）。不过作为首都长安的市，其规模比画像砖上所出现的市要大得多。长安东市，可能在汉初萧何受命筑城时已修建。据《史记·日者列传》，有司马季主“卜于长安东市”之说；《汉书·晁错传》也有晁错“衣朝衣斩东市”之载。似乎刑人之市的东市应为较西市为大的大市。据《汉书·惠帝纪》，西市在惠帝六年（前189）才落成。

汉代的市，已设官吏管理，且对入市的商贾置有市籍。《汉书·何武传》称：何武“兄弟五人皆为郡吏，郡县敬惮之。武弟显家有市籍，租常不入县，数负其课。市啬夫求商捕辱显家”。从这条史料可见西汉郡县亦有市，入市商贾置市籍，市中交易按定额纳税，称租或课。管理县级市场的官吏称啬夫。这位求商不畏权势，而何武也严于治家且不护短，反“白太守，召商为卒吏”，给秉公执法的求商予以提拔。汉代实行重农抑商政策，凡入市籍的商贾及其妻、子等家属均受歧视。汉制规定：有市籍者不得分田，不能坐车及穿丝绸衣服，子孙不得做官；与罪吏、赘婿等一起首先列为“谪戍”对象，即发配边地服苦役（分见《史记·平准书》，《汉书·文帝纪》、《景帝纪》、《武帝纪》，《汉书·晁错传》引《宁边劝农疏》）。而在汉初，却是“富商大贾周流天下”（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）的蓬勃兴旺盛景，汉武帝时杨可告缗法行，才导致“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（产）”（《史记·平准书》）的历史转折。然而即使在汉代，“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”也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作为买卖交易之地的市场数量增多，规模扩大，分布范围广泛，遍布城乡，反映了商业较之前朝有明显的进步。六朝故都建康（治今江苏南京），“商旅方舟万计”（《晋书·五行志上》），是魏晋南北朝最大的商业都市。其市场培育在孙吴时就已初具规模。山谦之《丹阳记》称：“京师四市：建康大市，



魏晋·屠宰图墓壁砖画

孙权所立；建康东市，同时立；建康北市，永安（258~264）中立；秣陵斗场市，隆安（397~401）中发乐营人交易，因成市也。”（《太平御览》卷八二七）又据《景定建康志·镇市》：“大市，在建初寺前，其寺亦名大市寺”；“北市，在大夏门外归善寺前”；“南市，在三桥篱门外斗场村内，亦名东市”。可与上述山谦之所述相印证。此外还有小市，如牛马市、谷市、蚬市、纱市、苑市、盐市等专业市场十余所。（参见《通典·食货·杂税》），“皆边淮列肆贩卖焉”。这些专业性较强的商店街，实际上也是同业街，即行市。据左思《吴都赋》的描述，建康之市水陆交通便利，轻便的马车可以驶过市中道路，高层的楼船可以直达市肆商铺。所谓“轻舆按辔以经隧，楼船举帆（帆）而过肆”。可以想见当日建康市场的繁华。其遗迹至南宋还存在，即“今（指南宋）银行、花行、鸡行、镇淮桥、新桥、笪桥、清化市皆市也”。可见南宋的行与南朝的专业小市是可以画等号的。而周应合还明确指出：“六朝市廛多在淮水之北，治城之东也。”从刘宋至赵宋，岁月流逝了800多年，建康市的设置地却一仍其旧。据《通典》及《南史·东昏侯本纪》等书记载，南朝建康的市设有市令、市丞、录事等官吏司管理之职。

中原名城洛阳，汉魏南北朝时期是东汉、三国曹魏、西晋、北魏的都城，合计约340年。经历朝建设，不仅是政治中心，也成为商业大都会。东汉至西晋，洛阳有三市：宋本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三引《洛阳记》云：“大市名金市，在大城西，南市在大城南，马市在大城东。案：金市在临商观西，兑为金，故曰金市；马市在东，旧置丞焉。”又引酈道元注《水经》云：“马市即嵇康为司马昭[所害之处]。”这里尚需补充说明两点，其一，金市的具体位置在“凌云台西”，“北对洛阳垒”（《水经·谷水注》引《洛阳记》）；南市，又称羊市或阳市，乃洛阳县市，一说又谓“平乐市”（陆机《洛阳记》）；马市，又称牛马市，《洛阳故宫名》曰：“吴、蜀二主馆与相连”；而《晋志》则曰：“五部、三市，东西七里，南北九里。”（以上分见《永乐大典》卷九五七八引元《河南志》转引三书）约略点明了三市在洛阳城的方位及其规模。其二，马市，东汉时已存在。顺帝永建（126~132）年间，定远侯班超之孙班始因杀其妻阳城公主坚得（章帝孙女）而被腰斩于马市，可为显证。南市即羊市，其位置，清人庄璟摹绘的《后汉宫城图》（据上引元《河南志·后汉宫城图》）中注明在平城门外明堂、云场以南。从南市与“吴、蜀二主馆相连”可知，这一南市始建于东汉，历经三国曹魏，一直延续至西晋。而大市始建于何时，是否亦从东汉延续至晋，史料语焉不详，但日本学者尾形勇《东汉洛阳城内宫城分布图》（载《东亚细亚世界帝国》，日本讲谈社，1985）标明金市东汉时在宫城以西，大城上西门和雍门之间，未审何据。不过亦无法排除其在东汉已存在的可能性。

晋代在市场内交易的商人，有规定的服饰，便于顾客辨认和市令的管理。《晋令》规定：“市侏卖者皆当着巾帖额，题所侏卖者及姓名；一足着黑履，一足着白履。”（《太平御览》卷八二八引）可见头裹巾帖额、足着黑白履为南朝市场商贩的形象，说明其社会地位不高，却反映了一个事实，即当时沿袭汉制也有市籍，有规定的统一服饰装束。是否有行话，语焉不详。似乎同业的行，在两晋已经萌芽。

北魏都城洛阳的三市，是汉、晋以来三市的历史延续。尽管北魏都城已重建，但三市的位置几乎未变，不过名称有所改变而已。关于洛阳大市，《洛阳伽蓝记》卷四记载：“出西阳门外四里，御道南有洛阳大市，周回八里”；“市东有通商、达货二里，里内之人，尽皆工巧、屠贩为生，资财巨万”；“市南有调音、乐律二里，里内之人丝竹讴歌，天下妙伎出焉”；“市西有退酤、治觞二里，里内之人多（酤）

〔酿〕酒为业”；“市北〔有〕慈孝、奉终二里，里内之人以卖棺槨为业，赁輓车（即丧车）为事”；“别有〔准〕〔阜〕财、金肆二里，富人在焉。凡此十里，多诸工商货殖之民。千金比屋，层楼对出，重门启扇，阁道交通，迭相临望”。这条史料十分可贵，详尽揭示了洛阳大市占有周长8里之地，面积有4平方里，加上周围8平方里的专营商业区及2平方里的富商居住区，共有14平方里，占全城320平方里面积的4.38%，实在是名实相符的大市。考古勘查也证实了这一点，大市遗址发现大面积的砖瓦堆土层，厚处竟达2米，可以想见昔日大市繁华之景象（文刊《考古》1973年第4期）。大市周围东南西北方向分布的8个里，以2里为一单元，分别以屠贩、音乐、酿酒、丧事为业，成为专营的商业区，此即行业的滥觞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：属于文化的音乐，已经商业化、产业化；而乐伎也成为专业的行当，这完全是由市场需求所决定的。至宋代，包括书画买卖、刻印书籍等文化产业已达鼎盛。

洛阳小市只占有一里之地，仍在城东。《洛阳伽蓝记》卷二有载：“出青阳门外三里许，御道北有孝义里”；《历代帝王宅京记》卷一〇载：“里东即是洛阳小市。”小市之北有殖货里，亦当以从事工商业者居住为主，里中有刘胡兄弟四人，均以杀猪卖肉为业，也许附近居民以南人为多，与大市适成鲜明对照。此外，城东建春门外设有租场，乃放置天下贡赋之地；其南设有马市，应是大牲畜交易的专业市场。

洛阳城南宣阳门外永桥（跨洛河古道）之南设有四通市，民间又称永桥市。其地即汉晋南市所在，不过规模较之前朝大得多。四通市周围，分布着金陵、燕然、扶桑、崦嵫四馆及归正、归德、慕化、慕义四里，分别居住着来自南、北、东、西四方的归附者。来自西域的胡商也集中居住在这一带，因此，四通市实际上具备国际市场的性质。据《洛阳伽蓝记》卷三记载，这里“附化之民，万有余家”；“天下难得之货，咸悉在焉”。四通市邻近伊水、洛水，“伊洛之鱼，多于此卖，士庶须脍，皆诣取之，鱼味甚美”，价亦昂贵。时京师有“洛鲤伊鲂，贵于牛羊”之谚。北魏规定：“吴人投国者，处金陵馆，三年以后，赐宅归正里。”此里“民间号吴人坊，里近伊、洛二水”；“三千余家，自立巷市，所卖口味，多是水族，时人谓为鱼鳖市也”（《永乐大典》卷九五七八引《河南志》），可证为了适应南朝人“食鱼与稻，渴饮茗汁”的生活习俗，还有为他们专设的鱼市，这也可视为四通市的附属小市。这种根据附近居民消费需求和习俗所设的专业商品市场，是北魏的创造。用现代的话说是适销对路，购销两旺。

南北朝时期，各州、县普遍设市，除城市中固定的商业市肆外，县还出现了定期的集市；唐宋时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乡村草市，最早出现于南朝。说明南方经济的长足进步和商业的快速发展。值得一提的是北魏头号富商刘宝，在北方建立了全国范围的连锁经营网，堪称世界上最早的连锁经营商。其总部设在都城洛阳，各要会之地遍设分号，史称其“州郡都会之处皆立一宅，各养马一匹。至于盐粟贵贱，市价高下，所在一例。舟车所通，足迹所履，莫不商贩焉”。乃至“车马服饰拟于王者”，富可敌国（《洛阳伽蓝记》卷四《法云寺》）。

（二）

本书重点反映的三百六十行，即各行各业的总称，当形成于隋唐时期。历来被视为末业的工商业，在隋唐之际有较大发展，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也有所提高。不仅京师长安“去农从商，争朝夕之利”，蔚然成风；东都洛阳“俗尚商贾，机巧成俗”；唐代有“扬一益二”之誉的扬州，也是“小人率多商贩，君子资于官禄，

市廛列肆，埒于二京”（以上并见《隋书·地理志》）。在江淮地区，人们竞相从事工商业，这在唐人诗文中也有不少反映。如刘肃《大唐新语》卷三云：“江淮俗尚商贾，不事农业。”又如姚合《庄居野行》诗云：“客行野田间，比屋皆闭户。借问屋中人，尽去作商贾。”（《全唐诗》卷四九八）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时尚与趋向。宋代则更发展得淋漓尽致。

隋代东都洛阳有三市，据杜宝《大业杂记》记载：其一，“大同市，周四里，在河南县西十里”。其二，通远（原误“达”）市，在跨漕渠的通远桥南，“市二十门，分路入市，市东合漕渠，市周六里。其内郡国舟船舳舻万计”。其三，丰都市，“南临洛水，跨水有临寰桥，桥南三里有丰都市。周八里，通门十二，其内一百二十行，三千余肆。……四壁有四百余店，重楼延阁，互相临映，招致商旅，珍奇山积”（宛委山堂本《说郭》卷一一〇，刊《说郭三种》页5073~5074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8）。隋都洛南96坊，洛北30坊，合计126坊（里），而丰都市最大占4里，大同市最小占1里，通远市居中约2.25里，合计7.25里，约占全城面积5.75%。

《太平御览》卷一九一引《西京记》则云：“东京丰都市，东西南北居二坊之地，四面各开三门。邸凡三百一十二区，资货一百行。”上引二书所载略有不同，邸店400或举其成数而言，100行与120行则未审孰是。但这在中国行业史研究中，是一条弥足珍贵的史料。早在隋炀帝大业（605~618）年间，即距今约1400年前，在东都洛阳的大市丰都市，就有了120行，3000余肆，平均每行有30肆左右，而且整齐划一。杜宝《大业杂记》描述行肆云：“薨瓦齐平，邈望如一，榆柳交阴，通衢相注”，为我们勾勒了一幅都市繁华的商业图。丰都市四壁有邸店400余家，主要是招徕商旅、提供货栈的集旅馆、餐饮、娱乐、仓储功能于一体的服务性店铺，其功能可视为为上述120行、3000余肆的行市提供货源与服务。这种情形，还可从唐长安由隋之“都会市”改称为“东市”的演变过程中得到证实。

隋代洛阳这三个市在唐代分别演变为西、北、南市。南市占二坊之地，西、北市各占一坊。西市在西郭的西南角，北市、南市分据北、南郭的中心。这三市又分别临近通济渠、漕渠、运渠，得水陆交通之便，这是立市的首要条件。北魏洛阳大市四周各有二里分设相关的商业、服务业设施的做法在唐代得到了延续，如洛阳北市东北有殖业、丰财二坊，东南有毓财坊，南市之北有通利坊，东北有殖业坊，西市之北有广利坊，顾名思义，多与经商有关。这类地名的出现，表明唐代洛阳继承了北魏的传统体制，在三市周围有相关的行业和店铺出现，构成了一个范围更大的商业区。又，徐松《唐两京城坊考》卷五指出：“唐之三市，皆非隋三市之旧。隋无西市，唐无东市。”实亦不过布局、名称略有调整而已。如丰都市实隋之东市，唐因“其在雒水南，故曰南市”；“唐以隋之东市为南市，故不置东市，而于隋南市之西置西市”。也许是李唐统治者不愿循亡隋之旧略作变动而已。在三市之中，以西市存在时间最短，自天授三年（692）始置，于开元十三年（725）废，其间还经历了一次废而复置，合计时间不到30年。也许与唐经济重心开始向东南转移有关。

唐代长安东市，隋称都会市。“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，四面立邸，四方珍奇皆所积累。”而长安西市“店肆如东市之制”（《长安志》卷八、卷一〇）。有学者认为220行或为120行之误，可惜未能举出过硬的史料依据；也有学者认为，西市亦只有220行或120行，但从史料显示的实际看，似乎西市的行比东市更多。史念海先生主编的《唐长安城商业及娱乐场所图》（刊《西安历史地图集》页95）根

据史料标明了东西市10余行的具体方位，不仅有涉及衣食住行的各种手工业、商业行，甚至还有如印刷、凶肆、赁驴、卖猴、善射、乐器、杂戏等服务、文化娱乐行当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：在邻近东西市的诸坊有许多旅馆、戏场、鞠场及一些茶肆、酒肆、饼肆、毕罗店、卜肆、车坊、佣车店等餐饮、服务、娱乐设施。还有金银珠宝店、卖鱼、卖蒸饼、修理乐器店、出租丧葬用品店、弩肆、毡坊等商业、服务业、手工业行肆，其中多为享有盛名的名店、大店（参见杨宽《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》页178~179）。其数量之多，行业之众，分布范围之广，远非北魏洛阳大市周围八个里以屠贩、音乐、酿酒、丧事为业者所能比拟。这表明，中唐以后，唐代的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，商品流通的规模有较大的提高，坊市制度逐渐废弛。当然，与其说坊市制限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，保护了自然经济，不如说是统治者出于政治上巩固统治、加强治安的需要。中唐以后，市场的扩容，商业的发展，冲破了这种由来已久的坊市制禁令。

另一方面，《唐会要》卷八六《市》载：大中五年（851）八月敕，“中县户满三千以上，置市令一人，吏二人；其不满三千户以上者，并不得置市官”；“诸县在州郭下，并置市官”。这反映唐代在县级已普遍置市，有的县如京畿昭应县（治今陕西临潼）甚至设两个市（《册府元龟》卷五〇四《革弊》）。但有学者却理解为三千户以上县许置市，三千户以下不许置市，将设市与置市官（管理市场的官吏）混为一谈，实有误解史料之嫌。早在景龙元年（707）十一月已颁敕令：“诸非州、县之所，不得置市”（《唐会要》卷八六《市》），是说不是州、县的治所（所在地）不得置市；换言之，则法令规定县以下才不许置市。但事实上县以下置市之例也不胜枚举，晚唐至宋还有日益增加的趋势。这也是由经济发展、商品交易大幅增加的社会需求所决定的。

笔者以为，作为行业的“行”，与行会之“行”是既有联系，又有区别的概念，不能混为一谈；更无法与欧洲中世纪的行会进行“比较研究”，两者根本没有可比性。作为手工业、商业、服务业等行业的“行”，始于隋初杜宝《大业杂记》所说的洛阳南市丰都市，内有120行、3000余肆，四壁有400余邸店。隋大业六年（610），洛阳西市大同市徙于殖业坊，占1坊之地，市开4门，立邸141区，资货66行。后“因乱废，唐显庆（656~661）中，因以旧市名坊”（徐松《唐两京城坊考》卷五）。即改隋殖业坊为大同坊，是用隋洛阳西市旧名。这丰都市120行或100行，共3000余肆，平均每行约有30肆；而唐代长安东市的行增加到220行，宋代行都临安的“行”更增加到440行，可惜史料对其所包括的肆（店铺）数语焉不详。说明隋唐的“行”，颇类似于今经营同类商品的商店（业）街，不过规模要小得多而已，实在看不出与行会之“行”有何共同之处。日僧圆仁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》卷四曾记载：“会昌三年（843）六月廿七日夜三更，东市失火，烧东市曹门已西十二行，四（千）〔十〕余家，官私钱物、金银绢药等物烧尽。”这里的“千”当为“十”，应是手民误刊无疑，中译本出校记引日本学者小野胜年博士改“千”为“十”，极是。隋洛阳丰都市每行约有30肆可提供一个力证，唐代长安东市的每行商店数应比隋略多，为近40肆。今天在日本正日趋消失的旧同业商店街堪称唐代行、肆的“活化石”，其每行的店铺亦不过数十家。

唐代的市，全国州县在在多有，晚唐时夜市亦很普及，如扬州已有夜市。王建《夜看扬州市》云：“夜市千灯照碧云，高楼红袖客纷纷。”李绅《宿扬州》曰：“夜市灯火连星汉，水郭帆墙近斗牛。”张祜《庚子岁寓游扬州》：“月明街廓路，星散市桥灯。”（分见《全唐诗》卷三〇一、卷四八一，蜀刻本《张承吉文集》）证

诸高彦休《唐阙史》“每重城向夕，倡楼之上，常有绛纱灯万数，辉罗耀烈空中”之说（《太平广记》卷二七三引），这里所谓的“重城”，似应在唐子城（衙城）与罗城相交之处。又据上引诗，这一夜市，依傍“水郭”和“街郭”，则市似又沿漕河（官河）及城郭大道而设。这一夜市，应即扬州大市。再如苏州，杜荀鹤《送友人游吴》、《送友游吴越》等诗，描述了苏州郭下及水乡的夜市，“夜市卖菱藕”，犹如一幅水墨风情画。在楚州（治今江苏淮安）有“千竹夜市喧”的热闹，在广州是蕃商云集的“蛮声喧夜市”（参见张邻《唐代的夜市》，刊《中华文史论丛》1983年第1期）。而在汴梁（治今河南开封）则是“水门向晚茶商闹，桥市通宵酒客行”（《全唐诗》卷三〇〇王建《寄汴州令狐相公》）。此外，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城乡的专业市如药市、蚕市、蛮市及定期或不定期的草市、野市、墟市、亥市等，表明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均突破了中唐前的坊市制，种种禁令在商品交易的市场规律冲击下已名存实亡。随着商业经济的日益繁荣，各种各样新兴的行业也在不断出现，这种情况到宋代达到了高潮。

唐代长安东西市今有史料可查证的“行”有：大衣行、肉行、铁行、鞦轡行、秤行、绢行、药行、帽行等（分见《两京新记》卷三，《剧谈录》卷上，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》卷四，《太平广记》卷二六一、卷一五七、卷二四三、卷二六三），东京洛阳则有彩行、彩帛行、香行、官锦行等（《洛阳龙门石窟石刻题记》，《太平广记》卷二五三）。此外，唐代各地也还有一些行名可从唐代文献中考得，如苏州的金银行，襄阳的席帽行，扬州的鱼行、麸行（分见《太平广记》卷二八〇、卷三九〇，《酉阳杂俎》续集卷三）。特别值得珍视的是，《房山石经题记汇编》提供了许多唐代天宝至贞元年间（741~805）北方地区的行名资料。如范阳郡有白米行、大米行、粳米行、屠行、五熟行、炭行、生铁行、绢行、大绢行、小绢行、新绢行、小彩行、彩帛行，涿州有肉行、果子行、椒笋行、染行、靴行、杂货行、新货行，幽州有油行、磨行等，未明州郡的有杂货行、布行、大绢行、新绢行、丝帛行、丝绵彩帛绢行、总绵丝绢行、幞头行等，合计有数十种之多（参见林元白《房山石经初分过目记》，刊《现代佛学》1957年第9期；曾毅公《北京石刻中所保存的重要史料》，刊《文物》1959年第9期）。令人费解的是这些“行”名却被一一填入了唐代长安西市图中（见《西安历史地图集》页95）。

据姜伯勤先生对敦煌、吐鲁番文书的考证，甚至远在边陲的沙州、西州也有画行、金银行、果子行、彩帛行、铛釜行、米面行、菜子行、帛练行等。唐、五代时期的沙州，存在民间画行、官府画院及作场（姑名之曰画坊），其间均有画匠活动的足迹。有趣的是，画匠中还分等级，有“画漆器先生、画床先生、画窟先生”等之分。正是这些画匠与同时应役的铜匠、弓匠、木匠、瓦匠、梁户、铁匠、甲匠、韦匠（制革）、皮匠、杀猪匠、油匠等一起，创造了灿烂辉煌、举世瞩目的敦煌文化（参见姜伯勤《敦煌的“画行”与“画院”》，刊《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》页13~29，中国社科出版社，1996）。既然画匠有画行，则上举十余种手工工匠亦应有各自相对应的民间自发组织——行，这样，在河西地区可确知的行，应有近20种之多。

唐代的行，已设行首，或又称行头、行老，这种制度一直沿袭至宋代。这种称谓迟至在唐初永徽（650~655）年间即已存在，当时成书的贾公彦《周礼注疏》卷一五诠释云：“肆长，谓一肆立一长……若今行头者也。”（同书卷九也曰：“肆长谓行头。”）是说《周礼》中的肆长，相当于行头。《太平广记》卷二八〇记载：吴俗，每年春秋两季“市肆皆率其党合牢醴祈福于三让王〔庙〕（即吴泰伯庙，在